



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几个问题 ——兼议王湾三期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魏继印

摘要:王湾三期文化早期的来源以尉迟寺类型大汶口文化为主,中晚期时又吸收了郑洛一带仰韶系龙山早期遗存的文化因素。龙山时代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所分布的河南中部地区存在一个王湾三期化的过程,逐渐形成了面貌较为统一的王湾三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背后的人群以东夷人群为主,包括但不限于祝融氏、大隗氏、夏后氏等其他族群。登封王城岗等王湾三期文化大型核心聚落的龙山晚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缺环,说明这些遗址的王湾三期文化居民减少,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是夏后氏重新占据这些遗址而形成的。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都城遗址,其下几乎不见王湾三期文化遗存,这也说明二里头古城并不一定为王湾三期文化人群所营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王湾三期文化并非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传统上认为的王湾三期文化为早期或先期夏文化的观点值得商榷。

关键词:王湾三期文化;东夷族群;夏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5-0017-08

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性质和族属问题,学界多认为是早期夏文化或先夏文化,似成共识。但笔者对其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主要源头是属东夷文化的大汶口文化,应是东夷文化向中原腹地扩张而形成的一支以东夷人群为主体的文化^①。这与夏人出自华夏系统的传统认识相矛盾。本文试对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与来源、背后的人群构成、煤山类型与禹征三苗、大型聚落的演变与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补充论证,以求得出更为科学的认识。

一、关于其形成与来源问题

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笔者在《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一文中主要根据对王湾三期文化最早的遗存分析,认为其主要源头是淮

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②,这一认识也得到了更多考古材料的支持。但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在汝颍河流域中游一带,即今河南省许昌、漯河和平顶山一带,此时期,西面的汝河上游、北面的郑洛地区主要还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孑遗,颍河上游则是大汶口系因素和仰韶系因素并存。到王湾三期文化中期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陶器方面表现为以乳足鼎、小口广肩高领瓮为核心的文化因素。

王湾三期文化形成自己的特色之后,其势力逐渐强大,其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扩张的主要方向是北向的郑洛地区。在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龙山时代早期既有大汶口文化遗存,也有当地仰韶文化系统遗存,至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一期时形成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导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上穿过嵩山进入洛阳盆地,以偃师

收稿日期:2025-03-18

作者简介:魏继印,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62),主要从事先秦考古学、文明起源、夏商文化、黄河与长江文明的互动与融合研究。

灰嘴遗址为基地逐渐扩展到了整个洛阳盆地。基本同时,在郑州地区的新密一带,新密新砦遗址所在地形成了典型的王湾三期文化,随后其影响扩展至整个郑州地区。在晚期时,北过黄河,在济源和焦作的南部地区形成了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扩展遗存,这一地区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边缘区。

从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河南中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在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存在一个王湾三期化的过程。因此,在整个王湾三期文化分布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文化来源不尽相同。《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一文主要对颍汝河流域中游一带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但郑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除了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外,也应当存在当地传统的文化因素。

(一) 颍河上游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

颍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嵩山南麓的河南登封,向东南流经许昌、周口、安徽阜阳等地,在安徽寿县正阳关注入淮河。颍河上游地区主要是指颍河流经的河南登封与禹州境内长约100千米的南北两岸的狭长地带^③,在龙山时代晚期,这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认为是王湾三期文化。颍河上游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有两个代表性遗址,禹州瓦店和登封王城岗,二者都面积巨大,都发现了城墙,应是整个王湾三期文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遗址。笔者也对这两处遗址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④。

在早于王湾三期文化的颍河上游一带,分布着前后屯类型和谷水河类型两类遗存。前后屯类型是由大汶口文化东进而形成的遗存,谷水河类型的主要源头是仰韶文化。瓦店遗址王湾三期文化来源于前后屯类型的因素约占六成以上,来源于谷水河类型和大河村五期类型的因素约占两成,另外还有少量的石家河文化因素。王城岗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于瓦店遗址王湾三期文化的中晚期,其文化因素来源于禹州瓦店王湾三期文化早期和前后屯类型的因素约占七成以上,另外还有少量的石家河文化和造律台文化因素^⑤。

(二) 汝河上游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

汝河上游地区王湾三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北

汝河上游的河南汝阳和汝州一带,代表性遗址有汝州煤山^⑥、李楼^⑦和北刘庄^⑧。

在年代方面,北刘庄第三期遗存为王湾三期文化,相当于郝家台王湾三期文化第二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黑陶次之,还有一定比例的夹砂棕陶。纹饰以篮纹、方格纹为主,还有少量绳纹、附加堆纹和弦纹。器形主要有细足鼎、深腹罐、盆、钵、甑、小口高领瓮和豆。煤山遗址1995年发现的墓葬,陶器组合主要是壶、豆、碗、杯,年代较早,约相当于郝家台遗址王湾三期文化的第一期。李楼遗址和煤山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相当于王城岗遗址王湾三期文化第三和第四期。

在文化因素的来源方面,煤山遗址第一期的壶、豆、杯等,明显来自大汶口文化。北刘庄第三期的深腹罐、细足鼎、平底钵、三足钵、钵形盆等明显来自当地的仰韶文化系统,而小口高领瓮、圈足盘、大平底盆、平底甑等明显来自郝家台第二期。李楼遗址第一期锥足鼎、柱足鼎、楞状足鼎、袋足鬲、豆、大平底盆、壶、瓶、小口高领瓮等来自更早的王湾三期文化,罍、单耳罐、钵形盆、碗、碗形器盖等来自中原龙山早期文化,板状足鼎、素面高领罐、陶鸟等来自石家河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平底罐形鼎等来自造律台文化;鬼脸状鼎足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煤山一期深腹罐、大口罐、条状足高足鼎、大平底盆、小口高领瓮、豆、圈足盘、斜腹盆、盂形刻槽盆等来自更早的王湾三期文化,斜腹杯、插钵、板状足鼎等来自石家河文化,罍、钵形盆、钵、钵形器盖等来自中原龙山早期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折壁器盖、大卷沿圈足盘、子母口瓮等来自造律台文化。

北汝河上游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又被称为煤山类型王湾三期文化,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新砦文化的源头。经分析可知,此区王湾三期文化的主要源头是许、溧、平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只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豫东造律台文化较大的影响,吸收了其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折壁器盖等文化因素。

(三) 郑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

郑洛地区是指郑州地区和洛阳盆地一带,

这里所谓的郑州地区是指双洎河和贾鲁河上游的郑州市区、新密、新郑、荥阳一带,不包括颍河上游的登封和洛阳盆地的巩义。主要遗址有新密古城寨^⑨、新砦^⑩,郑州沓兑王^⑪、马庄^⑫、牛砦^⑬、阎庄^⑭、大河村^⑮,荥阳点军台^⑯、竖河^⑰,郑州东赵^⑱等。洛阳盆地的典型遗址有洛阳王湾^⑲、西吕庙^⑳、西干沟^㉑、姪李^㉒,孟津小潘沟^㉓,偃师灰嘴^㉔等。

郑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面貌比较一致,其中郑州北部、郑州南部和洛阳盆地略有差别。郑州北部的陶色以灰色为主,纹饰以绳纹、方格纹为主,篮纹较少;主要器形有深腹罐、小口高领瓮、豆、鼎、单耳杯、碗、盆、甗、鬲、盂、壶、觚、簋、罍、双腹盆、刻槽盆、盘、器盖等。与颍河流域王湾三期文化不同的是,这里常见双腹盆、罍、甗,而乳足鼎比较少见。郑州南部的的新密古城寨、新砦等遗址,与北部的王湾三期文化有一些不同。高足盆形鼎、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折壁器盖、口沿带鹰嘴形钩的瓮等不见于南部。洛阳盆地的王湾三期文化,与郑州地区相比,最典型的文化因素乳足鼎更少,鬲则没有发现。

文化来源方面,郑州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深腹罐应主要来自当地的龙山早期文化。高足盆形鼎、罍、双腹盆等也明显来源于本地的龙山早期文化。而小口高领瓮、鬲、盂、瓶、壶、觚等均来自南部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甗、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折壁器盖、口沿带鹰嘴形小钩的瓮等则主要来自造律台文化。洛阳盆地王湾三期文化的鬲当来自豫西地区的三里桥文化。由此可见,郑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本地龙山早期文化,二是南部的王湾三期文化,三是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四是豫西地区的三里桥文化。

经以上分析可知,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非常复杂,其主要源头是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在郑洛地区,当地的龙山早期文化也是其主要源头;汝河上游地区的煤山类型、郑州南部的类型还受到了造律台文化的影响。总之,王湾三期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中原龙山早期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

二、关于其背后人群的问题

王湾三期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省中西部地区,但其最初是在许、漯、平地区形成的,主要来源于大汶口文化的尉迟寺类型,中期前段时主要向西北方向扩张至汝河和颍河的中上游一带,中期晚段时又同化了郑洛地区的文化,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从各类型的文化特征和文化来源的不同来看,其背后的人群也比较复杂。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尤其是在颍汝河中游一带,是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基础上形成的^⑤,其背后的人群很可能是以伯益为首的东夷人群^⑥,此外应当还有其他族群存在。

(一)祝融氏

祝融氏是五帝时代至夏代的一个著名氏族,出自颛顼。《礼记注疏》:“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1]《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杜预注:“犁为火正。”^[2]²¹³²《世本》:“老童生重黎及吴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3]⁴按:《国语·郑语》注:“颛顼生老童。”^[3]¹⁵《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氏火正……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4]¹⁶⁸⁹祝融年代记载最晚在禹时,《国语·周语》:“(内史过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5]

关于祝融的生活地域文献记载较为明确。《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郑,祝融之墟也。”^[2]¹⁹³³《汉书·地理志下》云:“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6]《毛诗谱·桧谱》云:“桧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桧国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泽之南,居溱、洧之间。祝融氏名黎,其后八姓,唯妘姓桧者,处其地焉。”^[7]以上文献表明,祝融氏族在今郑州地区生活过。

斟寻氏是祝融八姓之一,在夏代之前主要生活在洛阳盆地一带。《竹书纪年》云:“大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8]除太康、羿和桀居斟寻外,有学者还认为仲康、少康、孔甲等王也都以斟寻为都^⑦。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除太康、

后羿之外,少康及其以后的夏王均都斟寻或以斟寻为主都^⑧。《战国策·魏策》云:“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罩在其北,伊洛出其南。”^[9]《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对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87}《太平御览》引《纪年》云:“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10]《逸周书·度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11]《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12]这些先秦文献中的夏桀之国与伊、洛、龙门和嵩山有关。另外,后人对斟寻的注语中也有在洛阳盆地的说法。如《后汉书·郡国志》说河南尹巩县有寻谷水^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二师围郊。癸卯,郊、郛溃。”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郛中”^{[13]1441}。《水经注·洛水》更载明洛水北经偃师城东,且有郛水、郛城、上郛、下郛、南郛、北郛等^⑩。《括地志》更具体地说“故郛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14]。《左传·襄公四年》:“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杨伯峻注“斟寻在偃师县东北十三里”^{[13]937}。

(二)大隗氏

大隗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氏族。《庄子·徐无鬼》篇记载:“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15]《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密县》:“大隗山,在县东南五十里,本具茨山,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故亦谓之大隗山。”^[16]具茨山坐落在今新郑、新密、禹州三市的交界处,东西绵延约60公里,今新密市境内仍有大隗山、大隗镇等名称。有学者据此认为新密古城寨遗址的龙山时代古城应为大隗氏所筑^⑪。因此可以推论,这里的王湾三期文化应有大隗氏人群的参与。

(三)夏后氏等其他氏族

汝河上游一带以煤山遗址为代表的所谓煤山类型王湾三期文化,其实文化面貌非常复杂,在仰韶晚期主要表现为仰韶文化,接着受到了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随后又受到豫东造律台文化和颍河流域王湾三期文化的双重影响,所以陶器中有侧装三角形扁足鼎

和乳足鼎,还有比较多的折壁器盖等。

造律台文化的分布范围是以豫东为中心的鲁豫皖相邻地区,此地区在造律台文化之前为大汶口文化。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为东夷人所创造。但从它又是早期夏文化性质的新砦文化的主要源头的情况来看^⑫,其中应还有夏后氏族群。因此煤山类型王湾三期文化中除东夷族群外,还可能有夏后氏族群的存在。

总之,王湾三期文化背后的人群非常复杂,应该包括以伯益为首的东夷人,祝融氏、大隗氏、夏后氏等多种人群,但毫无疑问,以伯益为首的东夷人应是主体和主导人群。

三、关于煤山类型与“禹征三苗”的问题

煤山遗址最早的遗存以1995年发掘的一批墓葬为代表,其文化面貌与现在正在发掘的叶县余庄遗址王湾三期文化早期墓葬基本一致,主要为豆、瓶、碗器物组合,其年代大约相当于郝家台龙山文化第二期。而以前所谓的煤山龙山文化一期的年代约相当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期,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年代缺环。

煤山类型实质上是以煤山一期和二期为代表的。其主要范围仅限于今汝州境内的汝河上游一带,以煤山、李楼和北刘庄遗址为代表。之所以称为煤山类型,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一些煤山遗址特有的侧装三角形高足鼎。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学者把所有嵩山以南的王湾三期文化都划为煤山类型,并不确切。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是一种炊器,与夹砂深腹罐主要用于炊煮粮食类食物不同的是,它应是主要用来炊煮肉类食物。此种器物,在龙山时代早期主要存在于豫西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在龙山时代晚期是造律台文化最核心的文化因素,从早到晚一直存在,而且数量巨大。王湾三期文化的早期也有一些高足鼎,但其鼎足多为条状、锥状或柱状。如登封王城岗遗址一直作为王湾三期文化最重要的遗址,虽然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发掘,这种鼎的数量仍然非常少;禹州瓦店遗址虽然稍多一些,但其年代均比较晚,很可能是受到了新砦文化的影

响^⑧。关于煤山类型和其他王湾三期文化遗址少量的此类鼎,经类型学分期研究,早期应是受造律台文化的影响,晚期应是受新砦文化的影响。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是一种主观上的划分,其实并不存在^⑨。这一认识既对也不对。其不对之处在于,考古学文化是根据考古发现的各类遗存的特征归类划分的,而这些遗存是客观存在的。其合理之处在于,学者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界定一个考古学文化。比如煤山类型问题,有学者把嵩山南部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统称为煤山类型^⑩,也有学者把以淮河流域为中心、北至黄河、南至长江沿岸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都称为煤山文化^⑪。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的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但考古学文化的范围和类型划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划分标准不同而已。考古遗存是客观存在的,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进行考古研究的一种手段,其范围的大小以及类型的划分,大都出自不同学者不同的学术认识。

出于对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追根溯源以及对早期夏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深化研究的目的,笔者主张考古学文化更为细致的划分原则。因为煤山类型涉及二里头文化的形成、禹征三苗等重大学术问题,笔者主张从大处出发,从细处入手,弄清二里头文化中最核心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来龙去脉,以此来解读夏文化的来源、形成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是造律台文化中最核心的文化因素,也是煤山类型区别于其他类型王湾三期文化的标志性器物,问题的关键是两种文化中此种因素的年代。经笔者分析,煤山一期和二期的年代约略相当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期和第四期^⑫,与造律台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相比,其出现的时间明显偏晚,应是受到造律台文化的影响。

关于后石家河文化中的下王岗或乱石滩类型,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其为王湾三期文化南渐而形成的,进而解读是由于“禹征三苗”所致^⑬。但笔者经细致分析后认为,后石家河文化各类型是造律台文化联合王湾三期文化共同南下而形成的,尤其是与王湾三期文化毗邻的乱石滩

类型的形成,造律台文化起着主导作用^⑭。

南阳盆地是连接中原和江汉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原龙山晚期文化南下的桥头堡。从地理上看,南阳盆地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范围最为接近,与造律台文化分布地域的距离稍远,从理论上讲王湾三期文化南下更为直接。但从文化因素分析上看,并非如此。因为以淅川下王岗遗址龙山晚期文化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最主要的炊器是侧装三角形扁足鼎,这种鼎一直是造律台文化最主要的因素,当然在煤山类型中也有一些。关键是要弄清下王岗或乱石滩类型中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年代问题。下王岗遗址经过多次发掘,最早的发掘对此问题没有涉及;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进行了再次发掘,发掘面积很大,出土材料非常丰富,发掘者将其分为早期、中期早段、中期晚段、晚期早段和晚期晚段共3期5段,并与煤山遗址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下王岗遗址龙山文化中期偏早阶段大体与煤山一期相当”^[17]。这里所谓的“下王岗遗址龙山文化中期偏早阶段”是指第2段,其前面还有第1段,即早期,所以下王岗龙山文化第1段的年代大体相当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一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乱石滩类型的形成时间相当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一期,而煤山一期的年代相当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期,前者形成的时间明显要早于后者。因此,从时间维度上看,乱石滩类型不可能是煤山类型南渐而形成的。总体上看,煤山类型和乱石滩类型中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都是受造律台文化的影响所致,应该是造律台文化先传至汉水中游一带,然后才传入汝河上游地区的。由此来看,乱石滩类型文化不是由煤山类型王湾三期文化南渐而形成的,应是造律台文化联合王湾三期文化共同南下的结果。

四、从王湾三期文化大型聚落的演变看其与夏文化的关系

由于年代相接,分布范围大体一致,所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二里头文化或新砦文化前身的观点,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认识。笔者运用文化因

素分析的方法,对新砦文化的来源进行分析,认为新砦文化近八成的因素来源于造律台文化。另外,从文化因素来源来看,王湾三期文化的主要源头显然是东方的大汶口文化,所以其背后的人群虽然不能排除有夏后氏的存在,但显然是以东夷人为主体的。这一结论主要来自陶器文化因素,在此根据大型聚落演变的情况再做一些补充论证。

先看嵩山以南的王湾三期文化大型聚落。王城岗遗址的遗存以典型王湾三期文化为主,面积巨大,人口众多,还发现有王湾三期文化中规模最大的古城,甚至被冠以“禹都阳城”的称号。但遗憾的是,此遗址并未发现典型的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④,典型意义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应为第二期。也就是说,王城岗聚落在其龙山文化第五期时已然衰落,居民大大减少,直到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时由夏人重新占据,实现了再次繁荣。

禹州瓦店遗址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左右,发现了城墙、壕沟、祭坛、陶礼器等高规格的遗址和遗物,是目前发现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处聚落,显然是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心性聚落,不但人口众多,而且很可能有贵族在此居住。从考古发现来看,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此遗址显然走向了衰落。

郾城郝家台遗址面积虽然不大,但因发现了城墙,也是一处王湾三期文化的重要遗址。其龙山晚期遗存内涵非常丰富,共分为五期。其第六期,正式报告称为“新砦期”,据笔者分析,其年代应相当于新砦遗址第三期,应为新砦文化的晚期,年代要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王湾三期文化的孑遗,受到了新砦文化的影响。其真正的二里头文化也是从第二期开始的。

煤山遗址龙山一期和二期为煤山类型王湾三期文化,但其所谓的二里头一期,据笔者分析,其年代应相当于新砦遗址第三期,即新砦文化的第三期,年代应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其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为二里头三期,与前期之间还存在不小的缺环,很可能此遗址在相当于新砦文化第三期时衰落,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时才又为夏人所重新占据。

试想,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由王湾三期文

化直接发展而来的,那么王湾三期文化的人们又为什么要放弃他们经营了数百年的如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等这么多核心聚落呢?王城岗和郝家台遗址虽然发现了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存,但从中间还存在年代缺环的情况来看,这两处重要遗址为什么被放弃了数十年之后又被重新占据呢?这非常不符合常理。

再看洛阳盆地的大型聚落。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中最核心和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其为夏代的都城遗址已无争议。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年代已经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年代非常接近,甚至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层之下很少发现有王湾三期文化遗存。这说明,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并不是由二里头遗址的王湾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应是外来文化。

总之,从嵩山南北二里头文化分布的核心区核心聚落的演变情况来看,并没有证据支持二里头文化是由王湾三期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观点。更大的可能是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分属不同的人群,在王湾三期文化末期时,其人群放弃了经营数百年的家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其中的一些居址又为二里头文化人群所占据。其中的历史背景很可能是以夏后氏为主导的人群对土著人群的替换。这些土著的王湾三期文化人群很可能是启益争位时战败的以东夷人伯益为首的族群联合体。

结 语

通过对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及来源、王湾三期文化背后的人群、煤山类型及其与禹征三苗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以及从聚落演变的角度分析王湾三期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王湾三期文化,可以认为,王湾三期文化发端于颍汝河的中游一带,逐渐向北发展占据郑洛地区及黄河以北的焦作南部一带,整体上看,在河南中部地区存在一个王湾三期化的过程。王湾三期文化背后的人群不仅有东夷人,也有祝融氏、大隗氏、夏后氏以及其他人群。关于煤山类型与禹征三苗问题,从南阳盆地的乱石滩类型文化中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

出现的时间早于煤山类型的情况看,这些证据并不支持江汉地区的后石家河文化为煤山类型南渐而形成的观点。从嵩山南北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聚落的演变情况来看,现有研究也不支持二里头文化是由王湾三期文化直接演变而来的传统认识。

总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王湾三期文化不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其为早期夏文化或先夏文化的观点非常值得商榷。其族属应是以伯益为首的东夷人群。从考古学文化上看,确实存在新砦—二里头文化不断扩张、逐步蚕食王湾三期文化地盘的趋势。这恰恰与夏初启杀伯益建立和巩固夏王朝的历史背景相符合。

注释

①魏继印:《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考古》2017年第8期;《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族属探析》,《中原文物》2018年第2期;《对王湾三期文化族属的新思考》,《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②⑤魏继印:《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颍河文明——颍河上游考古调查试掘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④⑤魏继印、吕国豪:《从文化谱系看颍河上游地区龙山晚期文化和王城岗遗址的性质》,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庆祝王巍先生七十寿辰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84—214页,第184—214页。⑥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第5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河南汝州市煤山龙山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6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⑧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址2016—2017年度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⑩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⑪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荥阳王村遗址

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⑫郑州市博物馆:《郑州马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⑬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⑭郑州市博物馆:《郑州阎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⑮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⑯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高新区东赵遗址小城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5期。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⑳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吕庙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83—99页。㉒洛阳博物馆:《洛阳姓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㉓洛阳博物馆:《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㉔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㉕魏继印:《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族属探析》;《对王湾三期文化族属的新思考》。㉖江林昌:《文献所见夏民族的活动范围与考古学上对夏文化的探索》,《烟台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㉗高江涛:《二里头遗址与夏都》,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张国硕:《论二里头遗址的性质》,载许宏、杜金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4页;张国硕:《〈竹书纪年〉所载夏都斟寻释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张立东:《夏都斟寻与商都亳合考》,载《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26页。㉘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90页。㉙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502页。㉚周书灿:《大隗氏与新密古城寨龙山古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㉛魏继印:《论新砦文化的源流及性质》,《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㉜魏继印:《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㉝许宏:《关于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断想》,《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8页。㉞㉟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㊱袁飞勇:《煤山文化研究》,武汉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37—344页。③魏继印、李萌:《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遗存分析》,《华夏考古》2023年第3期。④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一书中,虽然有所谓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但非常不典型,发掘者之所以把它定为二里头文化一期,主要依据是其中有一件圜底深腹罐。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圜底深腹罐虽然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文化因素,但其是由平底深腹罐演变而来的,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深腹罐仍为平底,直至第二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圜底深腹罐,所以张海认为此期遗存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但从出土的平底碗等其他器物判断,笔者认为其年代约相当于新砦遗址第三期,年代仍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详见拙作:《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3108.
- [2]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3]世本八种[M].宋衷,注.秦嘉谟,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24.
-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1.
-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1651.
- [7]毛诗传笺[M].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北京:中华书局,2018:504.
- [8]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6-7.
- [9]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82.
- [10]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6.
- [11]黄怀信,张懋镛,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80-481.
- [12]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27.
-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4]李泰,等.括地志辑校[M].贺次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171.
- [15]张松辉.庄子译注与解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1:485.
- [1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35.
-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川下王岗2008~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355.

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Wangwan III Culture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angwan III Culture and the Xia Culture

Wei Ji Yin

Abstract: The Early Wangwan III culture primarily originated from the Yuchisi type of the Dawenkou Culture. During the mid to late phase, it incorporated cultural elements from the Early Longshan cultural remains of the Yangshao tradition in the Zheng-Luo region. During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the central Henan region inhabited by Wangwan III Culture, experienced a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gradually evolving into a culturally unified Wangwan III culture. This culture was 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the Dongyi ethno-cultural groups, along with other lineages such as the Zhu-Rong clan, Dawei clan, and Xiahou clan. At core settlements like Dengfeng Wangchenggang, there is a notable gap between the Late longshan cultural and the subsequent Erlitou culture, indicating a population decline among Wangwan III inhabitants. The Erlitou culture emerged following the reoccupation of these sites by the Xiahou clan. The Erlitou site—a capital of the Xia Dynasty—shows no underlying deposits from Wangwan III, suggesting that its construction was unrelated to Wangwan III populations. Contrary to traditional views, increasing evidence suggests the Wangwan III culture was not the precursor to the Erlitou culture,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it represented the early or pre-Xia culture.

Key words: Wangwan III Culture; Dongyi ethnic groups; Xia culture

[责任编辑/启 轩]